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官方知识

——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
(第二版)

迈克尔·阿普尔 著

曲囡囡 译
刘明堂

谢维和 审校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Second Edi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官方知识 —— 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 (第二版)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迈克尔·阿普尔 著

曲囡囡 译

刘明堂

谢维和 审校

OFF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Second Edi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第二版)/(美)阿普尔著;
曲囡囡,刘明堂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ISBN 7-5617-3952-4

I. 官... II. ①阿... ②曲... ③刘... III. 教育—研
究—美国 IV. G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006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官方知识 —— 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第二版)

著 者 迈克尔·阿普尔
译 者 曲囡囡 刘明堂
审 校 谢维和
策划组稿 金 勇
责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h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江苏宜兴市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24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6 000
书 号 ISBN 7-5617-3952-4/G·2223
定 价 2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丛书主编 袁振国 谢维和 徐 辉 张斌贤

选编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杰人 阮光页 张斌贤 金 勇

袁振国 徐 辉 谢维和

“迈克尔·阿普尔是世界上最致力于
建立一种批判性及民主化教育的最杰
出的学者之一。”

——保罗·弗莱雷,《文化战争:保守势力
复兴时代的学校与社会》的作者。

总

序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的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思想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和作家,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这中间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也希望不避烦难,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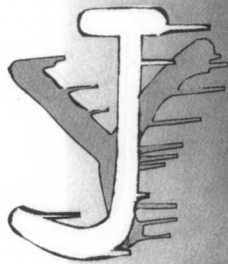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 (北京师范大学)

徐 群 (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 (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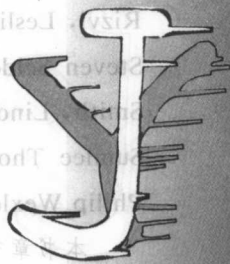


致 谢 辞

致 谢 辞

《官方知识》是承接“阿普尔三部曲”的第四部，其他三部曲分别是《意识形态与课程》（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教育与权力》及《教师与文本》。依历史概念之奇特造化，或许现在它更应被称为“四路之交汇点”。如同所有这些书一样，这一理念也根植于教育里知识与权力的关联之中。每一部书皆建立在其前者基础之上，并时时修正及扩展论据、延伸拓展新的领域。总而言之，这些书引证了我的斗争（包括其他很多人的帮助），以便理解民主的教育活动的限制及可能性。

这些关注的根源由来已久，我在对我所作的访谈中已有说明，此访谈附于本书之后。在对我影响至深的事情之中有一段是我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开始教书时我只有19岁）在美国最贫穷的城市之一的内城学校中任教的时间。那段时间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即无论在学校内还是在更大范畴的社会中，我们只有通过适当的政治途径减少体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阶级偏见的课程设置，增强批判性教学实践，密切学校与地方社团的关系，我和我的学生及同事才有可能取得广泛的胜利。此后，我担任了教师协会的主席职位，这些问题的结构性特质也变得日益清晰。此特质体现在很多方面，如他们在地方、州及国家三个层面经济中的优先性，在我们糟糕的公共卫生政策之中及间或有意的对于城市的毁灭等。此种压迫性情形原因的本质、根源及复杂性很多人都有经历，我对此事的认识日有增加，然而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对于这个社会对她的孩子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还有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愤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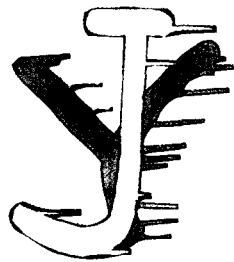


愤怒必然会使人难于集中精力,阻断理解复杂情形的能力。然而这也会成为一种良好的动力,使我们直达问题的核心。要知道现在是批判性教育工作受到来自右派的攻击的时代。

在第一段我已经提到我受到很多人的帮助。这个感谢名单会很长,而且它也可以更长。但是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性格缺憾,我愿意倾听,我喜欢别人对于我的工作提出批评,即使那些并不让我愉快。我们的任务是团体性的,除非我们可以尊重别人对我们提出挑战的权利,否则我们就没有贯彻我们应实行的策略。

以下的诸位对于我书中所作的探讨帮助很大。他们分别是:Pet-ter Aasen, Alicia de Alba, Peter Apple, Madeleine Arnot, Shigeru Asanuma, Jim Beane, Basil Bernstein, Lanny Beyer, Nick Burbules, Kathleen Casey, Lourdes Chehaibar, Somphong Chi-tradub, Linda Christian-Smith, John Clarke, John Codd, Bob Connell, Roger Dale, Linda Darling-Hammond, Gabriela Delgados, Ann De Vaney, Patricia Ducoing, Liz Ellsworth, Mariano Enquita, Steven Fain, Paulo Freire, Edgar Gonzales, Liz Gordon, Beth Graue, Maxine Greene, Stuart Hall, Ove Haugalokken, Allen Hunter, David Hursh, Alison Jones, Didacus Jules, Susan Jungck, Harvey Kantor, Koji Kato, Jane Kenway, Ki Seok Kim, Herbert Kliebard, Colin Lankshear, Ann Lieberman, Dan Liston, Alan Lockwood, Allan Luke, Carmen Luke, Marisol Martinez, Cameron McCarthy, Peter McLaren, Sue Middleton, Isamu Mizutani, Akio Nagao, Susan Noffke, Jeannie Oakes, Michael Olneck, Bertha Orozco, Bu Kwon Park, Paige Porter, Gary Price, Adriana Puigros, Fazal Rizvi, Leslie Roman, Judyth Sachs, Francis Schrag, Chris Searle, Steven Selden, Tomas Tadeu da Silva, Einar Skaalvik, Graham Smith, Linda Smith, Richard Smith, Jonas Soltis, Alfred Telhaug, Sumlee Thongthaw, Carlos Torres, Bonnie Trudell, Lois Weis, Philip Wexler, Geoff Whitty, Paul Wills 和 Kenneth Zeichner。

本书章节的草稿在下列机构中获得实证,我曾在不同时段内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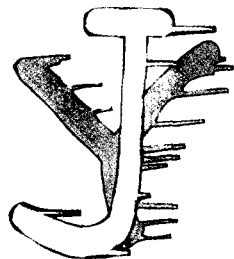
些机构内驻留过。他们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巴西的 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ilo Paulo，挪威的 University of Trondheim 和墨西哥的 UNAM。

Jayne Fargnoli 是我的朋友兼本书的编辑，她所提供的帮助显示了她作为一名编辑的才华。真诚地感谢 Routledge 出版社的 Heidi Freund，感谢她的工作和友谊。Diane Falkner 是我的秘书，她帮助我做了其他一系列的书。我欣赏她的关切，技巧及其责任感，同时还有 Patricia Martin 所做的一切。

在我的每一本书中我都将特别致谢麦迪逊城威斯康辛大学的星期五研讨会。来麦迪逊访问我的人经常惊讶于会在一个地方的一个时间内有一群致力于政治与教育的人在一起互相支持，狂热地探讨并且以此为乐。对于此我在本书第八章有所论及。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间参加星期五研讨会的数十人及最近参与的亦生亦友的博士们一直都在提醒我注意自己（及大家）的观点的弱点以及观点的表达方式。

以此书献给 Rima D. Apple，她是一名医药学、妇女问题及消费策略方面的历史学家。我们也有幸成为夫妻。过去的几年对我们来说是个噩梦，我们的一个儿子病重，而我们也一直在为是否要到另一所大学而犹豫不决。经历了各种困难，我一直在多方面对她倚重甚深。而且，如果她认为某些东西是废话，经常状况下它们就是废话。

本书的资助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基金和斯宾塞基金会。当然，研究的结果是我的而不是他们的。



序

言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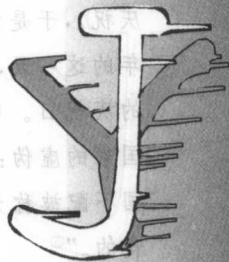
言

常识的力量

教育中实现长期的转变通常不是通过教育者或研究者的工作完成,而是通过社会运动在特定防线推动我们主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机构发生转变而完成的。因此,要想充分地了解在过去十年间的教育改革,就必须将它们置于特定的情境下进行考虑,即置于有色人种和妇女团体为争取文化认同和经济再分配而作的长期斗争中进行考量。^①即使是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如州的课本采用政策(这是在定义“官方知识”过程中最强大的机制之一)也是一个世纪以前广泛展开的平民运动和反北方运动,特别是形成和重新生成美国政体的在文化和权力方面所进行的阶级和种族斗争的结果。

因此,教育无疑再次见证了强大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及其影响。这些社会运动一部分可以导致民主化的加强和更高程度上的平等,而另外一些则建立在对于民主和平等的基本意义的根本颠覆之上,这在社会进程和文化发展上是巨大的倒退。不幸的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占了上风。

右倾趋势或“保守主义复兴”的缘由是右派长期以来在雄厚财力和意识形态方面建立基础广泛的联盟所作的努力。这个新的联盟在技术上被称作“新霸权集团”,它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它在与常识的对决中蚕食了大部分领地。也就是说,它创造性地将各种社会趋势与责任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组织在一个总的领导权之下,统一处理诸如社会福利、文化、经济及大多数人出于个人经历可以理解的教育事业等事宜。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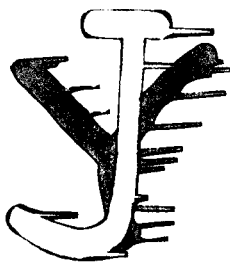


教育及社会政策方面的目标可以描述为“保守主义的现代化。”^②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被降格至消费行为。公民权地位成为单纯的具拥有权的个人主义。一种建立在仇恨和对他人的恐惧之上的政治策略被推动向前。我和其他许多人花费数年致力于批判性地探索这些趋势。保守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只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服务。这再次向我们表明,教育政策和实践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和价值评判性。这些趋势涉及诸如伦理道德和社会正义等概念的对抗。这就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要全面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就要把它们与更大范围内的冲突联系起来考虑。譬如那些被视为构成我们政体基础的基本理念已经脱离于我们主要的社会机构及日常生活之外。举个例子,我们常将我们的历史描述成自君主制向自由与平等进化的直线性历程,这也许忽视了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斯(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在内战后所说的话:“革命也会倒退。”也就是说,自由和平等一方面可以争取到,另一方面也可以被剥夺。^③

此外,我们所珍视的诸如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现在也受到了冲击。他们普遍地使用掩盖了富于争议的暗示和应用,这导致了严重的争论。这些理念的社会含义的定位没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斗争就不能实现。确实,诚如福纳(Foner)提醒我们的那样,要抓住诸如“自由”、“平等”等词的含义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取得富于力量的地位”^④。

这已经成为一种竞争,其表现是节日所传达的意义已有所不同。举个例子来说,内战之前的几十年中,北方的自由黑人在“自由”的进步之下反而颠倒了他们与美国的联系。7月4日是“我们”庆祝“我们”获得自由的日子(但在这一天全国上下许多非裔美国人被强令禁止公开庆祝),于是他们做出另外的庆祝日程表。他们确定了1月1日(1808年的这一天,奴隶贸易成为非法)和8月1日(西印度解放纪念日)这样的庆祝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谴责了这个国家的虚伪:一方面高喊自由,另一方面却保存了奴隶制度。他说:“美国不配被称为是伟大的或是自由的……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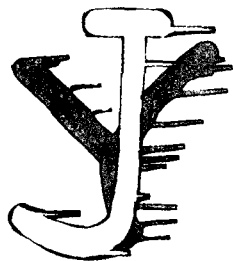


自由与平等的理念——他们所代表的和他们所被体现的方式随着时间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并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些意义强调了不受约束的经济行为,而另外一些则是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这些理念表现为受压迫民众争取人权、选举权、XIII 集会权、工作权及其他权利的斗争。然而这些理念却被用于将自由与虚弱的公共控制及自由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这些大相径庭的观念使得统治集团认为自由的真正领域在于“市场”而不是民主政治。这就使得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提出更为有力的质疑,即在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之下,真正的自由是否只是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而已。^⑥自由的理念作为一系列的消费行为体现在消费者的理想之中是一个更为崭新的领域,消费者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行为者的理想直到镀金时代来临才与自由这个概念产生了联系。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 20 世纪早期一份中西部报纸所引述的话中,它不无骄傲地陈述道:“美国公民对于国家的第一重要性不再是作为一名公民,而是作为一名消费者。”^⑦这种转变及其后果也是我想在《官方知识》这本书中涉及到的。

纵观我们的历史,个人权利与财产权存在着长期的斗争。诚如我想在本书中所体现的,这种张力是基础性的,他们建筑了一系列的论题,如教育应该做什么,谁从中获益最多以及应该如何控制教育等。

在杰出的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所著的 *Letters to Cristina* 一书中,他写道,任何的教育实践都是以梦想为指引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正因为如此,他进一步论证道,严肃的教育不能是中立的。它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和政治原则之上,教育应该克服固化状态和宿命论并使学习者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历史的主人。^⑧尽管保罗·弗莱雷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始于个人和社会领悟而终于改变世界”的教育理念却值得我们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对教育和“公众”概念进行攻击的时代铭记在心。这种观念要求我们在重视个人成就的小我的同时考虑一下作为团体的“我们”的概念。

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不管我们是否完全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与彼此紧密联系,并且与组织及破坏这个世界的各种特权相联系。特别是在这个世界进入全球化进程而人们对占统治地



位的经济及意识形态又缺乏清晰的洞察力的时代。^⑨或许一个关于这一点的私人小故事会有助于你理解我的意思。我从写出这些文字的建筑物的窗子向外望去,我看到了一座火力发电站。这是这个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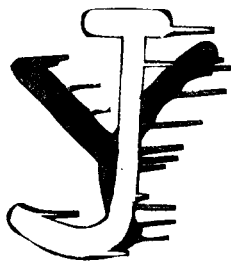
这个下午,迈克尔·阿普尔来到了办公室,他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打开灯和电脑,然后开始打字。我们自然可以将这些解读成简单的机械行为。阿普尔将他的手放在灯的开关上,打开开关,然后灯亮了。这一动作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你必须联系地看问题。迈克尔·阿普尔确实打开了门走进了办公室,打开了灯,走到桌子前打字,然而迈克尔却与那些挖煤的男女工人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他们所处的环境经常是危险而且又日益受到剥削的。煤的燃烧产生了电并保证了灯和电脑的运行。我对此篇文稿的打印全仰赖于此。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不是想搞清楚那些会使我们丧失活力的状况。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消极的含义,这在政治上都是极其复杂的。我的目的是想就常识的本质作一下严肃的声明。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些教育机构之内和之外的日常活动的方式使得我们很难了解自己所参与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

严肃的教育所应该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一种体会工作的必要工具,更是要不断改变我们对于自己在一个大的社会中的地位的正常理解。

我的基本意图就是运用保罗·弗莱雷的洞察力让人们去思考社会并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经常以某种很隐秘的方式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要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从常识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我们都是深受常识的影响。

这种关联性的国际性背景通过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所著《撒旦诗篇》中 Sisodia 先生之口表达得很清楚。他说:“英国人的麻烦在于他们的历史发生在海外,因此他们并不理解这种历史的意义。”^⑩用美国(United States)[而不是狂妄地称之为 America,因为在南北美洲(Americas)除美国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来替换英国并不能削弱拉什迪关于我们理解力的本质的敏锐洞察力,这也暴露了我们理解上的不足,即关于国内和国际关系以及这些经济、政治及文化的联



系所带给我们的不同收益的理解。

常识——我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通常理解——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诚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提示我们的那样,在我们对于世界及自身在其中的地位的解读中正确的判断力与错误的判断力是并存的。当然,这种对立的态势及推进力是我在本书及其他著述中方法论和政治上的基本框架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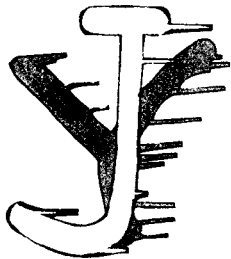
XV

走向未来

这些关于常识的力量及其内部冲突的论述若是与现实生活相脱节则显得过于抽象。种族问题在《官方知识》一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将以较为私人的方式开篇,下面就以最近我的个人经历来阐明我所做调研的政治及概念途径。

下面我所描述的是我到南非访问的经历。在一次大会上我试图反映常识的现状,在这里我必须诚实地说出个人的看法。我很清楚的是,在此所指出的种种有其特别的政治及教育承诺的背景。因此,参加这次大会的其他人和来南非参观的其他人或许看到的是一系列很不同的事件,而且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读也会大不相同。除此之外我还想说,尽管我的一些评论是批评性的,我却不想指责人们的动机。我确实认为,参与大会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出于改进这个和其他国家的教育的目的而行事的。我的批评所指向的是想说明过去的历史所创建的常识体系是多么地难以消除,即便是在政治改革已经出现的情况之下。

让我将自己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来开始说明这件事。在此书及其他各卷中我试图理清日趋复杂的教育政策、实践及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各种控制和剥削的关系。^①对于这些关系如何产生作用及如何在实践中被扰乱,我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②这就使我不单只从事于对不同力量团体的原动力在理论上、历史上及经验上的研究,我也会同持不同政见的团体、组织、进行革新的政府及来自不同国家的教育者一起工作以求获得更多的反对霸权和争取更多民主的成果。作为一名教师工会的前主席,少年时我的首次政治举动就是反对当时在美国还是合法的种族隔离制度。更近一些时候,我在韩国因为公开声称反对压迫性的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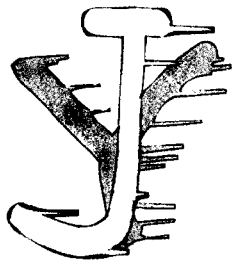
政府而被拘捕。我从来不是个浪漫主义者,不会去探讨怎样颠覆压迫结构。因为这些政治承诺和经历,我到南非的时候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有期待,另一方面也非常明白,虽然第一步已经迈出,随之而来的会是更加艰苦的斗争。以前我曾数度被邀请至南非公干然而始终未能成行。因此,这是我的第一次访问。

XVI

此行的缘起是在国际数学教育心理学大会(PME)上发言。尽管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数学教育发展动态的批评性文章,^①我接受这样一个自己无甚接触的团体的邀请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与南非严肃的教育家、政府官员、教师工会成员及社区活动家聚首并进行学术及政治讨论的机会。稍后我会讲到这些活动,因为它不仅使我对自己在南非所经历的产生反思,也会重新考虑我们经常会想当然的在南非和在美国都会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力量。

大概是因为侧重点的关系,此次大会看起来偏离了其现实状况的背景。看起来它不是在南非举行的大会,而且忽视了它是在国际社会多年对南非的联合抵制后在此地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的象征意义。因为此次大会是在南非的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召开的,其作为非洲人教育和文化中心的长久历史给大会增添了更多不真实的色彩。(确实,从开普敦机场到斯坦陵布什大学的沿途是连绵的“棚屋区”。清晰可见的是已融入南非政治地图的不平等的本质。人为的安排促成了这样以种族和阶级标准组织日常生活的范例。)参加此次大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来自非洲,在美国我们将其称之为“有色人种”,然而这些人的教育关注似乎很难得到重视。看起来要提出适合非洲具体状况的政治/文化/教育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所有的与会者而言,他们失去了一个解决他们的生活世界的数学教育意义问题的良好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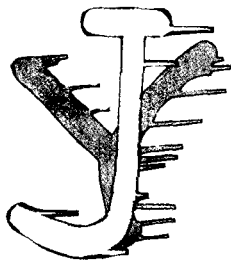
南非自然部分地参与了大会。在开幕式的发言者当中有一位是斯坦陵布什大学的官员,他承认错误主要是在过去犯下的,但是“现在我们拥有一个新南非”。同时也有一位有色人种的发言人非常诚实地提醒听众,她说自己所站立的讲台是几年以前她所被禁止的领域。然而尽管这些话诚实而有震撼力,它们却随着大会的进行而湮没无闻,因为



对于南非现实的基调自那以后就很矛盾。这种现实体现在与会者的议题只是关于南非的教育问题之时,也体现在对于旅游文化这种更加娱乐的形式之上。因此,在我的发言之前,一群黑人歌手和舞者为观众进行了表演,本质上他们表演的是工人之歌。表演受到了观众们的赞誉。(至少是一部分人,因为曾有一些参加大会的南非教育工作者不喜欢以这种方式开始大会,然而他们的意见却未受到重视。)然而基于此,南非文化的代表却是非主流人群为主流人群表演的文化。这种南非主体公民的文化形式的代表与美国的吟唱形式非常相似,然而这种相似并不令人愉悦。黑人作为非主流人群的肢体和文化被降格到用歌唱和舞蹈的形式来取悦占统治地位的白人群体。

但是就此结束对此事的探讨就会误解开幕式上真正发生的事情。正如米克黑尔·贝克汀(Mikhail Bakhtin)所说的那样,有时候受压迫的团体会用欢乐的庆典(他愿意称作狂欢节)将统治与被统治者的位置反转过来。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狂欢节上,贫穷的人们经常对统治阶级进行怪异的讽刺模仿并且以微妙但有力的方式在公开场合表演以颠覆现存的阶级关系。^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本次大会开幕式的表演上。工人歌者将主流观众的掌声在中途打断。他们的头领然后就控制了掌声的走向——先是右边的观众,然后是中间,然后是左边,再右再左却没有中间。他如此指挥着掌声的起伏,就如同他和其他的歌者将观众作为组成音乐的器具。在本质上,权力此时已掌握在非主流黑人群体的手中。但是观众中的许多人却未必会意识到发生的事情。可是对于我来说,这种权力的回归,这种谁在为谁表演的颠倒使得整个晚上有了意义。它有力地解释了被统治团体即使在统治团体设定的场景下仍可寻求空间来重写他们的命运的种种方式。^②(本书还会讲到这种狂欢的形式,不仅会提到它的潜力,也会对夸大其可能的后果提出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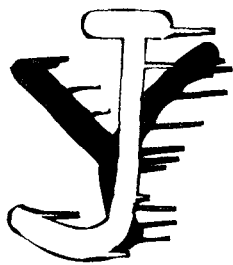
然而,权力的种族化形式的现实和伴随而来的常规性做法回归得太快。表演一结束,斯坦陵布什大学的一位大会负责人士就将歌者们又召回到舞台上——不是给他们掌声,而是在实际上命令(如果我们可以对他的话进行解释的话):“孩子们,来把这些用具都挪回去。”这样的一整件事——决定以非政治化、非中心化及较隐晦的方式来探讨南



非(及南部非洲)的情况、历史、斗争,特别是它的现状,以歌曲表演的形式作为黑人文化的主要代表而不将其置于他们的产生于兹的阶级与种族斗争的特定情形之中。歌者们在歌唱中将权利收回,而后是组织者以支配性的地位不假思索地让歌者们将用具掷出舞台——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过去和现在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现实普遍地存在并发生作用,即使在大会开幕式这样的小事中也得到了体现。就是这种持续的互动关系——在关于意义、生存空间,人身权利,在学校、媒体、国家及其他地点的日常生活中的规则上的斗争及占统治地位的团体如何努力保有或复兴他们所认定的规则——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

当然,也有一些雄辩的演讲者仅仅只是通过他们的存在及论据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呼吁人们关注在这个被种族、阶级及性别、等级所分裂的社会内的教育政策及实践。但是他们的雄辩却似乎只是来自外部无关痛痒的声音。也就是这种内部/外部的两分现实,“真正的”数学教育与暂时性的“非数学”的关注脱节导致了由大会主旨而引发的对于经济及政治的边缘化。尽管大会安排了关于民族数学(由已离开南非并移民至他处的学者所作,因此失去了在此论题上进行讨论所具备的政治上的杀伤力)及批判性的数学教育的讨论,后者尽管由南部非洲,南非及欧洲具批判性倾向的教育者所领军而在理论和政治上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论题,然而大会的主要走向忽略了这一股力量,甚至于想把它们整合至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策略之内。政治和不平等不是“真实的”东西。他们如同“构成性的外人”般被对待,对于那些想要显示他们与过去的斗争休戚相关的与会人士,大会则安排他们到监禁纳尔逊·曼德拉的罗宾岛进行朝圣。探讨当前的斗争状况不包括在这种职业性讨论之内。从本质而言,这里未被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南非已经改变了,现在让我们干点正事吧!就这样将教育与实践其中的物质环境相分离而习以为常。

然而,如果有人严肃地对待这些“外人”的话,比方说,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互动作为一期会议论题的主要侧重点,那么将会产生显著的兴奋点。这一点已经发生的事实再次说明了许多与会者,如同世界各地许多教育活动家一样,致力于将边缘化的东西回归到中央。但是这



XX